

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去向何方

李光耀设定的模式已经在发生变化，但后李光耀时代的管治不会有太明显的变轨，也不会有断崖式的变化。

■《环球》杂志记者 / 陈济朋

李光耀的辞世，令人们在悼念同时，也在思考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会如何发展。

《环球》杂志记者就此采访了两位背景不尽相同但都对新加坡有深入观察的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江雨和新加坡管理大学副教授陈庆文。

《环球》杂志：李光耀的品格中有哪些特质？

王江雨：他最伟大的性格品质是，既有极好的判断力，也敢于承担责任，直面后果，又务实不胡来。回顾他当初制定的许多政策，今天看来是新加坡繁荣发展的根本，但当初他的很多同事和追随者对这样的政策是很犹豫的，因为确实风险很大。李光耀不是不知道风险，但他个性中有坚持原则坚不退让的一面，所以能坚持下来。

陈庆文：他对新加坡的信念。他无比热爱这个国家，为了将新加坡建设得更美好而坚忍不拔。我最尊敬他的是他对新加坡的忠诚和投入。

新加坡是他一生的杰作，他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领导新加坡走过独立建国之后的历程。我们当时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寻求建立一个国家的多样化社会，李光耀带领大家前进，让我们相信能够建设一个国家。

《环球》杂志：李光耀对新加坡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陈庆文：最大的影响体现在新加坡的国家建设和国民身份的建构上。李光耀和那一代建国领导者以及建国一代的普通新加坡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他也影响到新加坡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我觉得他最大的影响是建立了一个让每一个新加坡人都引以为豪的国家。在新加坡庆祝建国50周年的时候，新加坡人在国外，可以因自己的国家在短短50年里取得的成就而骄傲。

没有李光耀和他的战友们，新加坡不会有今天的面貌。

他的去世让人们感到悲伤。人们会深深怀念他。对他的怀念也会激励新加坡人继续努力，在他留下的成绩基础上，继续取得辉煌的成功。

《环球》杂志：在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的政治生态会发生变化吗？

陈庆文：当然会发生变化。李光耀模式也同样必须要不断调整，以适应现实的变化。新加坡的政治生活近年来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也有了更多竞争。在新加坡，变化是常态，即便是李光耀模式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的。

李光耀设定的模式已经在发生变化。李光耀任总理时期有效的做法现在未必会继续那么有效，或者已经不能够再那么有效了。现在的新加坡社会与李光耀卸任总理时的新加坡社会也已经有了很大区别，甚至现在的世界也与那时候有了很大的不同。

《环球》杂志：变化会以何种方式发生？缓慢的还是激烈的？

陈庆文：管治不会有太明显的变轨，也不会有断崖式的变化。会有一些变化，无论李光耀是否在世，这些变化都会发生，这是因为现实发生了变化。

李光耀模式的痕迹会越来越淡化，这也是必然的，因为李光耀模式中的各种办法，必须要调整适应新环境才有意义。新加坡未来的发展路径会受到李光耀留下的政策和目标愿景的

影响，但这些政策和目标愿景也会依序随着环境的调整而进行调整。李光耀留下了基础，问题是未来的领导人是否会继续加强这些基础，还是慢慢削弱它。

《环球》杂志：李光耀给新加坡的决策机制留下了哪些影响？

陈庆文：无论是在人民行动党内部还是在内阁，我不认为存在所谓的直接干预或通过代理人干预，他不需要这些。有的只是他的影响和他的思想的魅力和个人魅力。关键在于李光耀对于年轻和经验更浅的领导层成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不管怎么说，李光耀当总理期间留下了一些基础性的和无法改变的策略方向，尽管这些也需要与时俱进。

《环球》杂志：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还会继续在他设定的道路上延续成功吗？

王江雨：这有赖于很多因素。李光耀在很多方面已经留下了一个制度框架，即使只靠惯性，也应该能维持一段时间。但如果没有他，也有群雄并起的可能，也许会有多个中心，充满不确定性。

陈庆文：李光耀留下的最大遗产，应该是缔造一个能够继续保持繁荣的新加坡。如果新加坡在李光耀身后不能继续取得成功，那也是对李光耀遗产的否定。

以李光耀打下的基础，新加坡没有理由不能继续取得成功。竞争是更加激烈了，但新加坡参与竞争所拥有的基础也更好。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必须是一个卓尔不群的国家，这对新加坡不是锦上添花，而是攸关生死的必要条件。新加坡的繁荣依赖于它的卓尔不群。新加坡缺乏自然资源，最重要的财富是人，新加坡必须对移民、贸易、投资、思想和信息保持开放。G